

# 中国革命史讲义

(五)

胡华主编

(校内用书)

北京师范大学

一九七八年八月

K266  
H50

022564

## 第五编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

# 目 录

##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

(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1)
第二节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0)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斗争.....	(23)
第四节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33)

## 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而斗争

(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

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针.....	(40)
第二节 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51)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殖民地化和爱国民主运动	

的空前高涨..... (62)

## 第十四章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而斗争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

- 第一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整军运动。毛泽东同志所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76)
- 第二节 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指示和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92)
- 第三节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104)
- 第四节 美蒋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及其被粉碎。百万雄师下江南，蒋家王朝的覆灭。毛泽东同志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 (121)
- 第五节 毛泽东同志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31)

#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

(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

##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战后的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世界的面貌大大地改变了，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世界上原来六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已被打败，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被严重削弱了，只有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战后的美帝国主义，走着德、日法西斯所走过的老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反动和侵略的中心。

美帝国主义采取希特勒“声东击西”的手法，也打着“防御共产主义”的旗帜，用来强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属于它，并对它们进行掠夺。美帝国主义还在远离美国本土的许多地方建立大量的军事基地和据点。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向外扩张，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也受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

与此相反，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各国人民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整个亚洲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拉丁美

洲人民广泛觉醒，特别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震撼着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国际阶级力量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

“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①在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有利的国际条件。

〔战后的国内形势〕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个极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地壮大了。在抗日战争的末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已经解放了约一千万的人口，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在苏联对日宣战以后，中国解放区军队立即向自己所包围的敌占区展开了全面的反攻。经过了艰苦的斗争，解放了广大的国土。这时，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长。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路线的胜利。战争的胜利果实，应该属于人民。只有人民的军队，才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来接受敌伪军的投降和收缴敌伪军的武器。

但是，在战后，美帝国主义却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和蒋介石国民党相互勾结起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帝国主义势力就大量渗入中国大后方，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内就积极反共反人民，他们把外国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日的武器保存下来，作为反共之用。日本刚投降，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80页。

他们就积极布置内战，企图消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全国建立黑暗的独裁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向美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就在上述的目的下，互相进一步勾结起来。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敌伪反攻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制止解放军的行动，竟下了“应就地驻防待命”的反动“命令”。其原因，就是国民党的内战军队远在大后方，不能马上赶到，唯恐敌伪统治区为人民军队所解放和控制。而且，为了发动内战的罪恶目的，蒋介石不惜和敌伪勾结起来，命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于是大批的汉奸卖国贼摇身一变，都成了国民党的“总司令”、“总指挥”，来替蒋介石“接收”，演出蒋、日、伪大合流的丑剧。

美帝国主义为了积极帮助蒋介石部署内战，除供给蒋介石以军火武器外，还用飞机、军舰等运送蒋介石军队到人民解放军所包围的大城市及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同时，美国还借口解除日军武装，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进驻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区。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向中国人民进行劫夺和侮辱。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依靠军事和政治的权力，已经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控制着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在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又利用“接收”的名义，对沦陷区人民实行了空前的掠夺。

在金融方面，四大家族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了敌伪各种金融机构和敌伪用残酷的方法掠夺而

得的中国人民的财富，截止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材料统计，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达二、四四六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四大家族的国民党政府在“接收”中更以二百比一的伪币与“法币”的兑换关系，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一次残酷的大掠夺。为着进行内战，国民党政府又继续发行大量的纸币，进一步搜刮人民的财产。

在商业方面，四大家族“接收”了敌伪的一切贸易公司和商行，以及敌伪向中国人民掠夺的大量物资。无数中国人民的血汗积累，从日寇手中转变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财产。

在工业方面，四大家族“接收”了敌伪用野蛮的强迫劳役和强制吞并的办法所建立起来的一切大工业。

此外，四大家族还把敌伪掠夺中国人民的一切农业机构以及自农民那里夺来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变为自己的私有物，并以此加强他们在农村中的统治和掠夺。

四大家族利用“接收”的办法把敌伪在中国强夺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各方面的财产占为己有。同时，他们为了内战，又以通货膨胀、征税、征粮和各种经济统制，大规模地榨取人民的血汗。这样，四大家族在战后便迅速地积累到二百万万美元的财富。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而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达到了顶点。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变得极为尖锐了。

这时，蒋介石反动派为了维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方针，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独占抗战胜利的果

实，使中国仍然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内战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美蒋反动派又继续玩弄“和平”阴谋。抗战胜利前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要求我党把军队交给蒋介石“统一指挥”，然后派人到蒋介石政府里去做官。蒋介石也竭力推行“你先交出军队，然后我给你官做”的反革命策略。抗战胜利后，美蒋反动派加紧玩弄这一“和平”阴谋，一方面妄图通过谈判诱使我党把武装部队交出去，另方面又借谈判来欺骗群众，掩盖其内战部署。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支配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日民族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了。蒋介石想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扶持，实现其对全中国的反动统治，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因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就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抗战后的主要矛盾，既如上述。但是人民中的各阶层对这种形势的认识并不都是清楚的。受党的教育较深的革命人民，是准备以坚决的斗争去反击蒋介石国民党的进攻，争取真正的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的。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对蒋介石国民党却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还在追求所谓“第三条道路”。因此，美蒋的“和平”阴谋在这些人中还有市场。

这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正流行着一股“交枪做官”的修正主义逆流。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白劳德就是这股逆流的最初代表。他在一九四四年就宣称苏、美、英签订的德黑兰协议，使世界进入了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

家“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新时代，因而在各国内部也应实行“阶级和平”。他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并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无产阶级政党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因此，他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主持解散了美国共产党。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战后，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的“交枪做官”逆流，这是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法共和意共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曾经获得空前的发展。但是，法共修正主义分子和意共修正主义分子却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完全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醉心于“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他们拿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作政治交易，向资产阶级交出几十万人的革命武装，换取了资产阶级政府中的副总统、副总理或部长等几个官职。这种投降做官的行径，根本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仅把这些国家的大好革命形势完全断送了。不久，法共、意共派到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也先后被资产阶级一脚踢出政府。

在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紧要历史关头，美蒋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方针已定，而革命人民已经具备了争取胜利的一切必要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但在国际上又出现了一股投降主义逆流，而美蒋反动派则加强玩弄“和平”阴谋的情况下，我党要不要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是摆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十分尖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

首先，毛泽东同志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党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国民党作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过去蒋介石打了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抗日战争中，又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实行“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反动政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还想照样来干”，“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消灭人民武装，抢夺胜利果实，这些都是蒋介石反动阶级本性的表现。因此，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指明了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是蒋介石一贯的基本方针。

总之，“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那末，这种斗争将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同志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以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国内斗争的形势是可能暂时沿着和平的方向发展的。就是说，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力量的强大压力下，有可能使蒋介石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拖延全国内战爆发的时间，不看到这种可能，并作相应的准备，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

国内战的方针已定，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危险，不看到这种危险，并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针对蒋介石的反动方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我党针锋相对的方针，全面论述了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同美蒋反动派斗争时，必须实行“针锋相对”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中国人民长期的斗争经验，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的总结。

反动派对付革命人民，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和平欺骗，一手是军事镇压，正如列宁所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一种是牧师的职能”。蒋介石用做官来引诱革命人民交出武装，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要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要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又必须对美蒋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充分作好对付蒋介石军事进攻的准备。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敌人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是针锋相对。敌人要谈，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革命人民对付反动派，必须准备好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

在反革命两手策略中，一切反动派总是以武装镇压作为主要的一手。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同反动派作斗争时，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打的一手即武装斗争上面。毛泽东同志指

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早已定了，我们要作好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了，有了准备就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共产党人对付反动派的办法，只有靠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

最后，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党的自力更生的方针，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武器论。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放在什么基础上呢。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叫做自力更生”。他说：“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一切内外反动派。”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国际援助，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一贯坚持的根本方针。

当时，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竭力渲染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的威力，使得我们有些同志，也害怕原子弹的威力，把它看得神乎其神，毛泽东同志尖锐指出，这种错误思想是受了资产阶级唯武器论的影响。这些同志不懂得“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他指出：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否则，就会被敌人的原子弹所吓倒。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从思想上武装了人民群众，坚定了革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斗争胜利的信心。觉悟了的中国人民是可以用小米加步枪，打

败有现代化装备的一切中外反动派，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终将遭到中国人民的惩罚。

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是一篇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它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时刻，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武装了党和人民，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的保证。这篇报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学说和策略思想。

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党同美蒋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坚决拒绝了他八月十一日的反动命令。同一天，又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揭露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中，驳斥了所谓拒绝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人民公敌的无耻谰言，指出人民公敌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从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我军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和敌伪军的顽抗，收复了大小城市五十九座，坚决地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

## 第二节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和重庆谈判〕 抗战结束后，身受长期侵略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虽然人们已经觉察到内战危机的严重存在，但在内战尚未全面爆发以前，仍然希望用一切方法争取和平。这时，蒋介石国民党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也假装同意人民的和平愿望，喊出“和平”、“民主”的虚伪口号，以图骗取人民的信任。

针对这种情况，我党一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从各方面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以便在蒋介石挑起内战时给予坚决的回击；另一方面，党为了争取和平并在和平斗争中充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又以极大的努力对蒋介石的和平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和平建国的总方针：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坚持这一方针，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宣言中并提出了克服内战危险的具体办法，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这些办法就是：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力，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党的这一宣言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是，在当时，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党是深深地知道国民党的内战阴谋的。

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但是，在人民内部的各阶级、阶层之间对于如何取得和平民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准备以坚决的斗争去争取人民的民主和真正的和平。而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却对反动的统治阶级抱有幻想，他们甚至认为蒋介石也有和平的愿望；他们虽然也对蒋介石统治不满，却又认为可以不用斗争而向他求得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在人民内部散布软弱的和平主义改良主义的幻想，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还准备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蒋介石国民党看到了这种情况也就利用了中间势力的弱点，不时的喊些“和平”、“民主”的口号，对人民进行欺骗，借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这种情况，就要求党必须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必须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破除中间势力的幻想，从而提高人民的觉悟。列宁主义教导说，为着革命胜利，单靠党的口号正确，是不够的；还要有这样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使群众根据自身经验来确信这些口号的正确。

八月中、下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他们的诡计是：如果毛泽东同志不去，他们就可以宣布中国共产党不愿谈判，把内战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同志去了，他又可以利用谈判的时机，进行内战的部署。这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同志完全洞察美蒋的和平阴谋，为了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的政治欺骗，用事实教育人民群众，和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同志决定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规定了我党和平谈判的方

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通知》要求全党必须作好粉碎国民党军队进犯的准备，“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下，到达重庆。这一伟大行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使国民党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

在和蒋介石谈判时，毛泽东同志从历史到现实，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阐明了我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谈判规定了总的原则。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周恩来同志是我党的主要谈判代表，我方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决定的方针，在谈判中，既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灵活性的策略，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我党交出政权和军队的无理要求。

在军队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全国军队。中国共产党表示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或至少二十个师，并且表示将其所领导的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同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军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军队也必须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缩减。但是国民党表示其所领导下的军队已在整编，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军队整编问题，未作任何肯定答复，只称